

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时空布局与优化策略

王俊亮

(江苏理工学院体育学院,江苏常州213001)

摘要:2015—2020年教育部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认定名单,借助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时空格局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均衡布局的基本策略。研究发现:时间维度上,各省级行政区划的“特色学校”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早期峰值型、中期峰值型、晚期峰值型3种类型;空间视角下,各个年份的“特色学校”不仅满足“胡焕庸线”分布,而且存在弱空间集聚效应;热点区域表现较为稳定,逐渐形成了“板块—极点”的分布格局,冷点区域主要以西部省份为主。教育经费、中小学数量、师资力量是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时空分布的核心影响因素,国内生产总值、中小学在校生人数则是其时空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未来,“特色学校”应借助与体育传统学校整合的发展契机,从办学理念整合、遴选标准整合、学校结构整合、建设资金整合、师资培训整合等方面进行统筹设计,实现校园足球的均衡布局。

关键词: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时空格局;体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G 8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24)04-0061-08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Layout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Chinese Youth Campus Football Characteristic School

WANG Junlia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list of youth campus football characteristic schools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rom 2015 to 2020, using the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spatial analysis, geographical detector, this paper reveals the space-time pattern featur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ur youth campus football characteristic school, and proposes the basic strategy for the balanced layout of youth football characteristic schools in China in the future. Research findings: in the time dimension,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characteristic school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early peak type, the middle peak type and the late peak ty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each year’s “characteristic schools” not only meet the “Hu Huanyong line” distribution, but also have weak spat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The hot spot areas are relatively stable, and gradually forming a “plate-pole”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the cold spot areas are mainly in the western provinces. Education funds, the number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eaching staff are the cor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youth campus football characteristic schools, while GDP and the number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future, “characteristic schools”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of integrating with traditional sports schools, and carry out overall design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selection standards, school structure, construction funds, and teacher training, in order to achieve a balanced layout of campus football.

Key words: campus football; featured school;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下文简称“特色学校”)是引领校园足球改革发展的排头兵,是校园足球改革发展经验积累生成的试验田,是校园足球加快普及发展的示范典型,在我国校园足球建设中具有极

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作为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载体,“特色学校”在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保障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等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建设质量将势必影响深化体教融合的改革成效。截至2020

收稿日期:2023-05-11

作者简介:王俊亮(1983—),男,山东潍坊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学校体育、体育旅游。

年,“特色学校”规模已达 30 783 所,提前完成了第一阶段遴选任务,但地域分布、学段配比并不完善^[1],发展失衡现象突出^[2],全国仅有北京、天津等 10 个省市控制在教育部规定的 6% ~ 8% 的学校总量范围内^[3],江苏、山东等 4 个省份的创建数量已超过规定限额的 2 倍^[4],违背了统筹兼顾、合理匹配的遴选原则。此外,“特色学校”还面临观念瓶颈、资源瓶颈、体制瓶颈等诸多发展困境^[5]。因此,在非衡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推进“特色学校”布局优化,探讨其未来高质量建设的基本策略,对于实现校园足球均衡、长远、可持续发展,加强学校体育综合改革,全面推进深化体教融合战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教育部遴选的“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为研究对象,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借助 ArcGIS10.2,定量揭示“特色学校”时空格局的主要

特征,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对体育特色学校的要求,提出“特色学校”均衡布局和未来发展的基本策略。

1 研究数据

截至 2020 年底,教育部共遴选了 6 批“特色学校”,共计 30 783 所,其中 2015 年 8 651 所、2016 年 4 755 所、2017 年 6 837 所、2018 年 3 916 所、2019 年 2 933 所、2020 年 3 691 所(2018 年教育部取消了 8 所质量不合格学校及 1 所重复学校认定资格)。此外,为探索“特色学校”时空布局的影响因素,研究还搜集了 2015—2019 年各省级行政区划的国内生产总值等 9 种类型数据,数据详情见表 1。

表 1 研究数据基本信息表

数据种类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1 026 ~ 72 812	1 151 ~ 80 854	1 310 ~ 89 705	1 400 ~ 97 300	1 697 ~ 107 671
专任教师数量/万人	3.53 ~ 90.09	3.61 ~ 91.04	3.57 ~ 95.07	3.90 ~ 99.26	4.08 ~ 103.07
普通小学数量/个	764 ~ 24 673	753 ~ 22 822	741 ~ 20 372	721 ~ 18 622	698 ~ 18 117
普通初中数量/个	97 ~ 4 565	98 ~ 4 557	98 ~ 4 515	99 ~ 4 519	101 ~ 4 603
普通高中数量/个	30 ~ 1 019	31 ~ 1 031	34 ~ 1 030	34 ~ 1 013	35 ~ 1 008
普通小学在校人数/万人	29.03 ~ 937.05	30.29 ~ 965.59	31.51 ~ 982.06	32.63 ~ 994.60	34.09 ~ 1 033.43
普通初中在校人数/万人	11.75 ~ 404.81	12.03 ~ 415.83	12.46 ~ 429.16	12.94 ~ 451.88	13.98 ~ 468.48
普通高中在校人数/万人	5.80 ~ 205.40	5.69 ~ 199.60	5.88 ~ 205.50	6.08 ~ 210.06	6.55 ~ 215.88
教育经费/亿元	178 ~ 2 042	149 ~ 2 243	166 ~ 2 522	167 ~ 2 805	179 ~ 3 217

2 研究方法

2.1 数理统计法

主要用来统计各年度不同省级行政区划“特色学校”的认定数量,以及“特色学校”的内外结构。

2.2 空间自相关

2.2.1 全局自相关

主要用来测度“特色学校”在空间总体分布特征。全局自相关通常用 Moran's I 表示,如果 Moran's

I 取值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则代表“特色学校”在空间上集聚分布,取值越趋向 1 表明其集聚的程度越强;如果 Moran's I 取值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则代表“特色学校”在空间上分散分布,取值越趋向 -1 表明其分散的程度越强。

2.2.2 局部自相关

主要用来揭示“特色学校”在部分区域内的具体分布特征。局部自相关通常用 Getis-Ord $G^* i$ 指数表示,如果 $G^* i$ 为正,代表该区域属于高水平集聚区,反之,该区域则属于低水平集聚区。

2.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王劲峰开发的探测空间分异性并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该方法能较好地处理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假设条件的要求也较为宽松。地理探测器包含 4 个主要功能:因子探测、风险探测、生态探测、交互探测^[6],本研究主要利用因子探测功能揭示“特色学校”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因素。

3 “特色学校”时空分布格局基本特征

3.1 时间演进态势

在遴选过程中,31 个省级行政区划逐渐形成了 3 种不同的发展类型(见图 1):第 1 种为早期峰值型,包括天津、江苏、河南等 18 个省级行政区划,主要特点是“特色学校”认定数量在遴选早期(2015 年)便

达到峰值,随后在波动中逐渐下降;第 2 种为中期峰值型,包括上海、北京、浙江等 11 个省级行政区划,该类型的特点是“特色学校”认定数量在遴选中期(2017 或 2018 年)达到峰值,随后逐年下降;第 3 种为晚期峰值型,此类型仅包括山东、云南两省,“特色学校”认定数量峰值出现在遴选晚期(2020 年)。

3.2 空间分布特征

3.2.1 全局自相关

总体来看,各年度的 Moran's *I* 为正(见表 2),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该时间段全国“特色学校”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即“特色学校”分布较多的地区集聚在一起,“特色学校”分布较少的地区集聚在一起。进一步分析发现,各年度 Moran's *I* 取值范围均较小,除了 2016 年超过 0.1 以外,其余 4 个年度均小于 0.1,说明我国“特色学校”空间分布集聚程度较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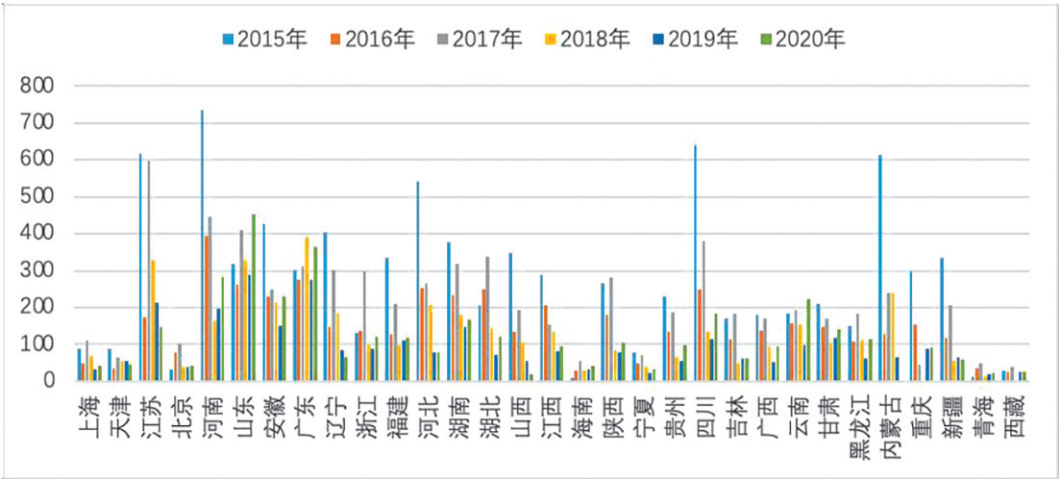


图 1 2015—2020 年省级行政区划“特色学校”认定结果簇状柱形图

表 2 2015—2020 年我国“特色学校”空间集聚特征

年份	Moran's <i>I</i>	<i>P</i> (<i>I</i>)	空间格局
2015	0.049	0.007	集聚分布
2016	0.114	0.025	集聚分布
2017	0.092	0.020	集聚分布
2018	0.066	0.019	集聚分布
2019	0.047	0.013	集聚分布
2020	0.053	0.024	集聚分布

3.2.2 局部自相关

表 3 显示,我国“特色学校”热点区域较为稳定,

例如,新疆、山东、山西、四川、安徽、湖北、海南 7 个地区都是历年“特色学校”空间分布的热点区,其他分布类型变化较为剧烈。总体来看,我国“特色学校”热点区域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板块-极点”的分布格局,其中“板块”指的是以山东、山西、安徽、湖北、河南、四川等省级行政区划组成的面积较为广阔的连片区域,该区域集中了“特色学校”空间分布的大多数热点区、次热点区。“极点”指的是以新疆、海南为代表的部分零散区域,这些孤立区域是历年“特色学校”分布的热点地区,而冷点区域主要是以西部省份为主。

表 3 2015—2020 年我国“特色学校”空间格局冷热点分布

区域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2020 年
热点区域	新疆、辽宁、山西、陕西、河北、山东、安徽、四川、湖北、海南	新疆、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四川、海南	新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四川、海南	新疆、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海南	新疆、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海南
次热点区域	吉林、河南	河北、陕西、上海、江西	陕西、重庆、江西、浙江、上海	河北、重庆、上海	河北、重庆
一般区域	黑龙江、宁夏、重庆、贵州、浙江、上海	辽宁、江苏、浙江、福建、重庆、广西	辽宁、广西、福建	辽宁、浙江、江西	黑龙江、辽宁、宁夏、浙江、江西、贵州
次冷点区域	甘肃、江苏、湖南、福建	内蒙古、吉林、甘肃、青海、西藏、云南、贵州	吉林、宁夏、青海、江苏、云南、贵州	内蒙古、吉林、北京、天津、宁夏、江苏、贵州、广西	吉林、北京、上海、福建、广东、广西
冷点区域	内蒙古、北京、天津、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江西	黑龙江、北京、天津、宁夏、湖南、广东	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北京、天津、西藏、湖南、广东	黑龙江、甘肃、青海、西藏、云南、湖南、广东、福建	黑龙江、甘肃、青海、西藏、天津、江苏、湖南、云南

4 “特色学校”时空分布格局影响因素分析

4.1 影响因素筛选

“特色学校”是一个包含微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系统的社会生态^[7],其布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结合前人研究及本文推理,综合考量指标的代表性及数据可获取性,初步筛选了 5 个层级的 9 个影响因素,对其进行定量分析(见表 4)。

表 4 “特色学校”时空分布影响因素

因素层级	编码	影响因素	影响方向
经济发展水平	X1	国内生产总值	正向
经费投入	X2	教育经费	正向
	X3	高中在校生数量	正向
	X4	初中在校生数量	正向
中小學生数量	X5	小学在校生数量	正向
	X6	高中数量	正向
	X7	初中数量	正向
中小学数量	X8	小学数量	正向
	X9	专任教师数量	正向

4.2 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功能对“特色学校”时空分布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见表 5)。横向来看,相同年份各个指标的解释力存在差异,但差异较小,充分证明“特色学校”的时空分布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纵向来看,各个因素在不同年份的解释力存在波动,说明不同因素对“特色学校”时空分布的影响并不稳定。本研究按照 $P_{D,H}$ 均值 0.5 为分界点,将探测因子的解释力划分为核心和重要两个等级。其中,教育经费(X2)、高中数量(X6)、初中数量(X7)、小学数量(X8)、专任教师数量(X9)5 个影响因素的 $P_{D,H}$ 均值大于 0.5,说明这些影响因素解释力最强,是核心影响因素;国内生产总值(X1)、高中在校生数量(X3)、初中在校生数量(X4)、小学在校生数量(X5)等 4 个影响因素的 $P_{D,H}$ 均值在 0.4~0.5 之间,说明这些影响因素的解释力较强,是重要影响因素。

4.2.1 核心影响因素分析

(1)教育经费。教育经费对“特色学校”的时空分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足球专项师资的招录、培训、晋升,足球场地的建设、维护、管理,比赛训练的服装、交通、食宿、餐饮等均离不开一定的财力支持。当前,教育部每年安排 5 000 万资金支持“特色学校”的建设,但对 2 万余所“特色学校”来说仍显不足,特别是广大西部地区及乡村地区的“特色学校”,经费总

量少,来源渠道单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特色学校”建设的积极性和长久性。《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到 2025 年“特色学校”将达到 5 万所的建设规模,现有经费数量将难以

应对“特色学校”数量的快速扩张,而且未来先期布局的“特色学校”将转向提升建设质量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由重普及向普及与提高并重的方向发展,届时对资金的需求会更加迫切。

表 5 我国“特色学校”时空分布影响因素探测结果

影响因素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2015	0.24	0.38	0.41	0.34	0.44	0.43	0.38	0.42	0.67
2016	0.38	0.69	0.69	0.71	0.49	0.66	0.78	0.75	0.69
2017	0.58	0.52	0.36	0.45	0.43	0.67	0.54	0.55	0.76
2018	0.70	0.50	0.35	0.45	0.46	0.37	0.45	0.49	0.75
2019	0.51	0.52	0.38	0.47	0.45	0.49	0.53	0.56	0.54
均值	0.48	0.52	0.44	0.48	0.45	0.52	0.54	0.55	0.68

(2)高中数量、初中数量、小学数量。各地区中小学是“特色学校”布局的主要载体,中小学数量较多的地区“特色学校”分布也相对较多。截止到 2019 年底,“板块”区域 6 个省级行政区划共有中小学 74 202 所,占全国中小学总数的 32.8%,相应的该区域 2019 年“特色学校”数量共计 8 179 所,占全国“特色学校”总数的 30.2%,可见规模庞大的中小学是该区域“特色学校”大量分布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西部地区人口数量和学校数量都远远不及东部地区,在“特色学校”的建设上不具备规模优势,而且在合村并校进一步推进、城镇化率持续提升、少子化趋势未根本扭转的社会背景下,西部地区的学校和学生数量可能会进一步萎缩,从而导致我国“特色学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进一步加剧。同时研究还发现目前东部地区“特色学校”已占该地区中小学总数的 12.53%,而西部地区“特色学校”仅占该地区中小学总数的 10.36%,西部地区中小学仍有较大存量发展“特色学校”。

(3)师资力量。足球师资是开展校园足球的重要人力资本,师资配备较好的地区“特色学校”往往分布较多,反之则分布较少。有研究发现我国足球专业教师占体育教师的比例高达 25%^[2],但我国体育师资较为紧缺,足球专业教师的绝对规模仍然较小。2017 年教育部开展的一项针对“特色学校”的调查显示,足球师生比为 1:243.3,而且足球教师中有足球专业背景的比例仅为 26.8%,平均每所学校不到 1 人,这仅是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水平,西部地区足球师资的匮乏尤为严重,不仅师资数量少,而且专业

能力也相对较弱,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校园足球的发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创建指标体系》明确规定,足球专项师资大于 4、3、2、1 人(含)以上的分别给 4、3、2 分。部分西部学校由于难以在师资上达到相关要求,未能入选“特色学校”建设名单。未来,随着第二阶段 3 万所“特色学校”的快速布局,西部地区的足球专业师资供需局面将更加紧张。

4.2.2 重要影响因素分析

(1)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常用指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地方除了直接以较高的教育经费支持当地“特色学校”的发展外,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可以为“特色学校”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通常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地方,体育事业较为发达,足球文化氛围比较浓厚,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人们对足球运动的认识也较为超前,有更多闲暇时间投入足球运动。另外,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区域对各类足球人才而言也更具吸引力。总之,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区域一般会形成各项事业良性互动的社会生态,这样的社会生态恰恰是“特色学校”发展需要的宏观大环境。2019 年底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增速有所减缓,对“特色学校”的布局和建设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但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全国各地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正轨,未来校园足球仍然具备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2)高中在校生数量、初中在校生数量、小学在校生数量。通常人口越是稠密的地区,“特色学校”的分布也会越多。例如,2019 年,河南、广东、山东、

河北、四川的各级各类中小学在校生人数排名全国前 5 位,而当年以上省份的“特色学校”数量分别为 1 938 所、1 557 所、1 607 所、1 347 所、1 519 所,分别位列全国第 1、4、3、6、5 位,两者虽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小學生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特色学校”的分布。但从相对值来看,“特色学校”分布格局并不合理,其中万人拥有“特色学校”数量最多的是内蒙古,达到 5.3 所,而万人拥有“特色学校”数量最少的是广西,每万人仅拥有 0.9 所。“特色学校”是普及和发展校园足球的主体力量,是开展足球教育的示范和标杆,普及是发展校园足球的头等大事,也是“特色学校”的根本任务。显然,“特色学校”的布局现状不利于足球运动的广泛普及,未来“特色学校”的布局应充分考虑人口因素。

5 “特色学校”均衡发展及深化体教融合的基本策略

《意见》指出:按照“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学校体育模式,整合原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体育特色学校,由教育、体育部门联合评定体育传统特色学校。未来,“特色学校”应借助与体育传统学校整合的发展契机,从办学理念、遴选标准、学校结构、建设资金、师资培训等方面进行统筹设计,实现校园足球的均衡布局。

5.1 融合办学理念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体育特色学校主导部门不同,导致办学理念存在一定差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是 20 世纪 80 年代体育部门牵头,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的学校体育工作较好,素质教育较为突出,学生体质显著提高,并形成了一定运动项目传统的学校,是开展课余训练,发现、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办学形式^[8]。体育部门更多从国家体育战略出发,借力国民教育体系培养全面发展的竞技人才,实现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体育特色学校是 2014 年以来,教育部门逐渐命名并发展起来的以足球、篮球、冰雪等项目为体育运动特色的学校。就“特色学校”而言,教育部门更多从立德树人的角度出发,尝试以足球为工具,通过教会、勤练、常赛等体育教育形式,实现足球育人的目的^[9]。经验表明,办学理念的差异和偏离会很大程度影响校园足球的建设质量,因此,体教融合要坚持理念先行的原则^[10]。未来足球传统

特色学校的创设应实现办学理念的融合,尽快扭转校园足球建设中出现的重运动队、唯比赛成绩等竞技倾向,将“健康第一”摆在立德树人的突出地位,切实发挥足球运动在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等方面的综合价值。同时,各级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到体教融合面向全体儿童青少年的实践逻辑^[11],在足球传统特色学校的遴选上要兼顾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学段差异,确保“健康第一”理念对不同地区、不同学段、不同学校的全覆盖,通过校园足球的均衡发展,使得体教融合惠及更多儿童青少年。

5.2 统一遴选标准

制定统一的遴选标准是评定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的前提。以往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体育特色学校分别采用了独立的管理办法和遴选标准。足球传统项目学校依据的是 2013 版《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管理办法》,“特色学校”依据的是 2018 版《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创建指标体系》,两套遴选标准在指标设置、指标权重、测评内容、测评标准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遴选更加注重运动成绩(0.2)和人才的培养与输送(0.2),而“特色学校”对运动成绩无明确要求,输送优秀学生运动员的权重值也仅为 0.03,而教育教学的权重则达到了 0.27。足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评定首先要实现遴选标准的统一,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应在理念融合的基础上,尽快统一两套不同的遴选标准,出台《足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创建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设置既要内容全面又要重点突出,通过指标权重凸显体育教学、业余训练、体育竞赛、体育文化等“健康第一”的育人内容。另外,新的遴选标准要体现不同地区的发展差异,以解决校园足球建设的布局不合理问题。例如,可以适当降低西部地区、乡村地区的准入标准,或者对于接近标准的学校可以考虑先纳入建设范围,通过边立边建,立建结合的方式加快“特色学校”和足球传统项目学校薄弱地区的校园足球建设水平,助力校园足球实现普及化、均衡化、公平化发展目标。

5.3 调控学校结构

以往“特色学校”和足球传统项目学校的占比并不一致。目前“特色学校”30 783 所的规模约占全国中小学的 14%,未来 5 万所“特色学校”遴选结束后占比会超过 20%,而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目前数量稳定在 15 000 所左右,其中开展足球项目的占 15%^[12],总量约为 2 000 余所,约占全国中小学的 1%;另外,两类学校的内部学段占比也并不合理。

“特色学校”遴选之初,教育部就规划按照高中、初中、小学 1:3:6 的学段比例进行认定,而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认定尚缺乏权威的标准,仅有学者建议应该按照国家级、省级、地市级 1:6:18^[12] 或 1:7:12^[13] 的层级比例进行认定。目前“特色学校”高中、初中、小学的学段比值约为 1:1.6:2.6^[4],距离预设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同样,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不同学段的分配比例也并不十分协调,甚至出现了倒挂现象,高中、初中、小学的占比分别为 62.28%、38.28%、27.99%^[12]。不合理的学校占比会一定程度影响校园足球的高质量建设,规模过大会耗费大量建设和监管成本,易出现重申报、轻建设现象,规模过小则对校园足球的示范引领作用有限,而学段结构不合理影响足球青少年的正常升学流通,不利于校园足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未来足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的认定应充分结合两类学校的结构特点,根据不同地区中小学规模、不同学段学生数量,儿童青少年成长规律、足球运动发展规律、升学便利性 & 区域竞赛组织等情况,按照普及与提高并重的原则,科学调控学校结构参照标准。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标准控制各地区认定规模和学段比例,在实现校园足球均衡发展的同时,为儿童青少年搭建长期习练足球的教育环境,形成完善的中小学足球后备人才培养框架,推动校园足球实现高质量发展。

5.4 聚拢建设资金

我国校园足球的建设资金主要由国家和地方两级构成。从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来看,2012—2014 年,国家年均投入 1 040 万元,用于支持传统项目学校的建设。不同省份的投入情况差别较大,西部地区 3 个省份甚至没有任何投入^[14];从“特色学校”来看,2015 年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 6 亿 4 800 万元,各省份投入校园足球的财政、体彩和社会资金等累计达 196 亿 300 万元^[9]。总体而言,虽然我国校园足球的注资规模逐渐递增,但与庞大的建设数量相比仍显不足。经费来源渠道单一、经费规模较小,仍有不敢花、省着花的现象出现^[15]。而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的资金投入差距较大,西部地区校园足球建设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另外,以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特色学校”的名义分别投入,导致财力过于分散,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未来足球传统特色学校的建设应改变原本独立、分散的资金投入模式,根据学校规模、场地建设、师资培训、足球赛事等顶层设计内容,聚拢两类

学校的建设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充分发挥建设资金的杠杆作用,通过一系列配套措施,辅助足球传统特色学校形成完善的区域布局。一是要在政府校园足球建设经费中设立“专项帮扶基金”,专门支持中西部地区足球传统特色学校建设。另外,根据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情况,建立专项帮扶基金随国民经济增长的正常浮动机制,确保经费增长的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匹配。二是开辟企业赞助、社会捐助、体彩公益金等多种社会融资渠道,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依靠多种途径充实专项帮扶基金池容量,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5.5 整合师资培训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特色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师资培训体系。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师资培训以提高体育教师的运动训练专项能力为重点,主要包括国家集中培训、西部分片培训和中东部 19 省(市)培训 3 种组织形式。“特色学校”师资培训主要是通过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骨干师资国家级专项培训的形式开展。另外,教育部还聘请国外专业足球讲师培训校园足球教练员,选送校园足球教练员赴英、法等国进行技能培训。总体来看,我国校园足球尚未形成统一的师资培训制度,而且现有的分片培训规模偏小,西部地区校园足球仍然受到师资不足的困扰。未来教育、体育部门应充分整合两类培训体系的优势,在延续专项技能、执教技能等培训内容的基础上,根据足球运动的特点,围绕满足运动兴趣、提升身体素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等育人目标,设计以健康第一理念为引领的足球师资培训内容,建立统一的培训课程体系及师资认证制度,持续扩充足球师资规模,不断提升师资培训质量。此外,要继续加大西部地区的师资培训力度,促进校园足球的公平、均衡发展。一是在继续完善国家西部分片培训,扩大培训规模的基础上,以省、市、县为单位,搭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多级师资培训体系,聘请足球教学名师、优秀教练员、相关专家学者定期开展校园足球师资轮训活动,逐步实现对西部地区足球师资培训全覆盖。二是建立东西部省份足球师资对口援助计划,选派优秀足球师资赴西部地区任教,定期组织西部地区足球师资赴东部地区学习交流,相关部门要在工作补助、生活补贴、职称评聘等方面出台配套政策,鼓励相关教师积极参与师资培训。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依托 2015—2020 年教育部公布的“特色学校”名单,量化了“特色学校”的时空分布特征,对其影响其布局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地理探测器分析。研究发现:(1)时间上,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划“特色学校”数量的发展变化表现为早、中、晚 3 种不同的峰值类型。(2)空间上,“特色学校”呈典型的非均衡式分布。演进过程中,热点区域逐渐形成了“板块—极点”的发展格局,即以山东、山西、安徽、湖北、河南、四川等拼凑形成的板块区域,以及新疆、海南 2 个极点区域。冷点区域则主要以西部省份为主。(3)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教育经费、中小学数量、师资力量是影响“特色学校”分布的核心因素。基于以上发现,研究结合深化体教融合对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体育特色学校整合发展的政策部署,提出应采取融合办学理念、统一遴选标准、调控学校结构、聚拢建设资金、整合师资培训等多方举措,在实现“特色学校”均衡发展的同时破解自身发展困境。

本研究对“特色学校”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突破了以描述性统计为主要手段的传统分析模式,初步明确了“特色学校”布局主要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推动学界对“特色学校”布局问题的认识走向深入。相关研究发现在深化体教融合政策框架内提出的“特色学校”发展策略,对于优化“特色学校”空间布局,推动落实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受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东西部差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推进“特色学校”均衡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此种情况下,西部地区学校应立足开足、开齐体育课,加强校园足球的普及工作,营造良好的校园足球氛围,培育崇尚足球运动的校园体育文化,为更多学校进入“特色学校”建设序列夯实基础。东部地区学校则应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吸引优秀退役专业运动员担任学校足球教练,重点抓校园足球的提高,通过国民教育体系培养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

另外,本研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所学校成功入围“特色学校”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本研究聚焦的影响因素数量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除了本研究关注的人力、财力、物力等物质性因素以外,未来应将诸如地方足球氛围、政策扶持力度等环境支持因素纳入研究范畴,以进一步完善多因素共同

驱动下“特色学校”布局的原理机制。另外,仅仅从数量维度关注“特色学校”的发展远远不够,后续还需要更多研究从质量维度对“特色学校”持续跟进,在实现布局优化的同时,推动其建设质量同步提升。

参考文献

- [1] 刘振卿,吴丽芳,张川. 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建设的若干问题探讨[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9, 42(06): 33-40.
- [2] 李卫东,刘艳明,李溯,等. 校园足球发展的问题审视及优化路径[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9, 43(05): 19-23.
- [3] 杨志鹏. 2016 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布局现状与发展对策的研究[D]. 北京:首都体育学院, 2017.
- [4] 杨献南,吴丽芳,李笋南. 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管理的基本问题与策略选择[J]. 体育科学, 2019, 39(06): 3-12.
- [5] 胡庆山,曾丽娟,朱珈萱,等. 校园足球热的审思——兼论中国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6, 39(01): 126-131.
- [6] 王劲峰,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J]. 地理学报, 2017, 72(01): 116-134.
- [7] 李旭龙,沙洪成,陈洪鑫. 社会生态学视域下校园足球育人功能的制约因素及实现路径[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9, 38(01): 1-6.
- [8] 许闽峰. 我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由来和发展[J]. 中国学校体育, 1996(01): 66-68.
- [9] 刘海元. 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发展情况及对当前主要问题的思考[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8, 30(03): 209-213.
- [10] 布特,段红艳,诺日布斯仁. 从体教结合到体教融合:从资源耦合向制度耦合创新发展[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1, 44(09): 33-44.
- [11] 王俊亮,葛春林. 体教融合演进历程、逻辑转向及实践策略[J]. 体育文化导刊, 2020(12): 98-104.
- [12] 惠陈隆,冯连世,胡利军,等. 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现状调查与发展对策研究[J]. 中国体育科技, 2016, 52(01): 53-59.
- [13] 李相如. 中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发展现状与管理机制研究[J]. 体育科学, 2006(06): 16-27.
- [14] 惠陈隆,冯连世,胡利军,等. 我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管理现状分析:成效、问题与对策[J]. 中国体育科技, 2017, 53(01): 9-16.
- [15] 张碧昊,郭敏,李卫东. 省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建设的现状审思与策略选择——基于 H 省 91 所学校的实地调研[J]. 体育学研究, 2020, 34(04): 30-37.

[责任编辑 江国平]